

## 关于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

蒙和巴图苏和那顺德宝胡泊

### 一、关于研究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目的与意义

(一) 本项目为国内外蒙古学研究中的空白。为适应蒙古族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需要，为批判地继承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之精华 应创建这个新学科。

(二) 在 1984 年福州全国哲学规划会议上，哲学史组一致建议把蒙哲史列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以期打开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适应在国际学术交往中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大国地位。我们课题组承包本项目以来，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 二、关于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及采用的方法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课题组成立大会上讨论确定的指导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指导下，以哲学思想为主线，以其它各门学问的主要成就为重点，着重研究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规律性。

在贯彻这个指导思想时，我们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在个人分工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小组的集体讨论，谁起草谁修改，分歧观点的取舍由执笔人做主；二是分编委的讨论审改，原则上仍由原起草人执笔修改，但分歧观点服从编委决定，反对编委决定的观点可写入注释。

### 三、关于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这分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介绍。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关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关于蒙古族古代哲学史的基本特点，以及

关于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逻辑进程。

首先，我们在科研中着重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重要观点有：

（一）哲学是文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宗教的天敌，是其它各门学问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因此，对于一个文明民族来说，关于有无哲学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是否经历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文明史的问题，而不只是像有些人所说那样有无“哲学专著”和“哲学家”的问题。

（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文明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哲学史上只有唯物论和辩证法才是“真正的哲学”，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则是非“真正的哲学”。前者是哲学史的主流，而后者则是支流。并且，唯物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而辩证法在本质上也是唯物的，所以科学的辩证唯物论是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形态。因此，研究一个民族的哲学史主要是弄清它辩证法思想和唯物论思想的发展规律，而在近现代史上则主要研究它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律性问题。

（三）哲学的党性是它作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的战斗性，而这是它有效的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根本保证。因此，哲学世界观和朴素实在论、自然科学唯物论等“无哲学意识”的普通世界观的根本界限，就在于它们的党性表现。离开这个根本的标志去评论是不是“真正的哲学”的议论，都是无稽之谈。

（四）在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说来辩证法先于唯物论，自然观先于社会观，世界观先于方法论，这是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到深的进步过程。因此，那些把自然观和社会观割裂开来、颠倒过来的所谓“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之畸型说等等，也都是无稽之谈。

其次，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这在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主要的有：

（一）宗教是把世界万物在幻想中颠倒了的世界观。其所以如此，是为了适应反动统治阶级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需要。所以，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因此，宗教和哲学既不可以混淆，也不可以替代，所谓只有宗教而无哲学的文明史是历史的谎言。

（二）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哲学是摆事实、讲道理以普遍真理说服人的学问而宗教则是讲奇迹、讲迷信以神鬼之力去吓唬人的说教。然而，当宗教教条被用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现行政策辩护时，它不再是宗教而是“哲学的变种”了。反之，当哲学唯心论、形而上学为宗教教义之“合理性”辩护时，它也不再是哲学而是实际上的“僧侣主义”了。

（三）在哲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上，尤其当宗教遭到古代哲学的致命批判之后，企图引用哲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为自己教义辩护，于是形成了宗教的哲学。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在为翻身解放而斗争中，也往往引用宗教的某些教义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和宗教的哲学不同，是另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变种”。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要“出世”还是要“入世”，混淆了这个原则区别也就歪曲了历史。所谓汉族“儒教”宗教说，也正是这类错误。

（四）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神话和宗教传说历来都是从属于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的，二者对立的焦点在于“征服”还是屈服于自然力。古今中外的宗教宣传家们，往往都以混淆这个原则界限的手法来歪曲神话，以扩大宗教的历史地盘。

第三，关于蒙古族古代哲学史的特点。蒙古族有无哲学之争，主要是指古代哲学而言。并且，这也是所有不发达哲学之被人视而不见的共性。

（一）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思想内容与形象化的表述方式相结

合，是这种哲学的概念、命题的基本特点。如蒙哲史有一个古老的命题为‘身有首 衣有领。’（见《蒙古秘史》第 33 段）这在一般意义上说，是指一切事物整体都在它关键性局部的支配下存在着；但这个普遍真理是被用来着重说明国家君主体制或社会阶级压迫之天然合理性的。所以有些人便说它讲的是政治，而不是哲学。可是离开了哲学 政治还有什么“天然合理性”可言呢？这种通俗化表述方式 还有哲理谚语、哲理格言、哲理寓言和哲理诗等等 在古代主要是哲理格言，而在中世纪则主要是哲理诗了。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这种形象化表达形式的特殊意义，说这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不是理论思维 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而只能称之为“广义哲学”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错误的。因为，就其主要论据而言，离开逻辑思维的形象思维是不存在的；具体的说，这些逻辑思维之形象化表述形式 也是完全可以还原的。以上述“身、首”命题为例 它在逻辑学上，是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的通俗化的结论，即把抽象的一般性结论还原为它原来的典型性较强的前提而成。不只哲理格言如此，哲理寓言等表述方式也都如此。可见，形象化表述方式只是对于思想内容的一种通俗化形式，所以只要遵循典型性原则就不会妨碍其思想内容之深刻的哲理性。

（二 在逻辑上虽然理论化、系统化程度不高 但在实践中却不失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而是否能充当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这是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广义哲学史”论者们说它是“尚未理论化、系统化”等片面性、表面性的错误 就在于离开这个“证据”去议论哲学的“真实性”。

何谓“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命题之理论化程度 表现为它所反映的事物普遍性本质之深刻程度。如上述“身、首”命题之对于整体和局部的辩证关系的反映等。哲学理论之系统性，则既表现为它“时代精神”之系统性 又表现为它学科对象之系统性 而后者

以前者为基础。如‘身、首’命题作为奴隶制国家学说的基本命题，它和其它关于治国安邦的谚语、格言如‘手有所置、足有所踏’（意为各得其所）；‘深足令死、众足令畏’（意为团结奋斗）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它时代性系统；而它的学科性系统，则表现在显示其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如“干头独尾蛇遭难、独头千尾蛇免灾”等命题的内在联系之上。由此可见，蒙古族古代哲学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不但不可忽视，并且还应该承认它的理论思维能力已经步入了辩证逻辑的境界了。

（三）哲学命题之世界观和方法论两种功能的统一是哲学理论之理论化、系统化的内在根据，又是它达到必要水平的外在标志。当蒙哲史发展到中世纪时，国家学说的基本命题成了“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这不但在理论上把阐明国家体制之一元化的合理性推进到了最高地步，并且也把“尊无二上”这个方法论原则强化到了新的阶段。如成吉思汗在镇压通天巫篡权阴谋时，揭穿其要害在于和成吉思汗“思与齐之”！这就使当时为之辩解的劳苦功高的父亲蒙力克老人也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见《蒙古秘史》第 246 段）通天巫是萨满教最高代表，他的篡权阴谋是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可见，如无成吉思汗以前的哲学革命淡化了对萨满教的迷信，就难以揭发批判通天巫的复辟罪行。

（四）人们对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古代哲学之视而不见的现象，是根源于他们自己对发达哲学的某种神秘化。因为：1. 蒙古族古代哲学的上述特点，既是所有不发达哲学的共性，也是任何发达哲学在它初期阶段上的重要特点。以古希腊哲学为例，人们不但可以从泰勒士等人的哲学言论中，而且还可以从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中看到这种情形。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等等。可见，不发达哲学不是和发达哲学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哲学，如所谓‘广义哲学’之类。

发达哲学在它们发达起来之后，也不是对这种通俗化表述方

式抛弃不用了。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两极相逢”这个“深入人心的古老的辩证法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之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哲学范畴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提出的“矛盾”概念等等。人们从这里还不难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心目中，古代哲学的这种形象化表述形式是“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的一种必要形式。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然而，在人类文明史以往的每一历史时代，发达哲学总是极少数，而不发达哲学却是绝大多数；因而每一民族文化中的哲学要克服它对立面的宗教迷信，都需要和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这不但是不发达哲学之借以从宗教束缚下发达起来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发达哲学之给宗教迷信以更大打击的必要条件。因而，在每个区域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哲学是主导而不发达哲学则为基础；正如离开主导的基础是看不远的一样，离开基础的主导也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理解不发达哲学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发达哲学，不能真正理解哲学史。这正是黑格尔哲学史观之陷入哲学神秘论即哲学无用论的认识论根源，也是盲目抄袭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广义哲学史”论的认识论根源。

第四，关于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逻辑过程。在蒙古族古代文明史的开端问题上，我们依据自己的科研成果，采用了拉施特《史集》之“化铁出山”说。依据此说，在公元 14 世纪前大约 2000 多年前，蒙古部族在一次周围其他部族的联合围攻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显然是说，蒙古人当时是该地区的霸权者，所以才成为众矢之的而难以逃走。由此可以推知，蒙古人当时之由盛而衰的最早年限，当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后了。

（一）古代蒙古族也和其他文明民族一样，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奴隶制社会。一些史料表明，那时蒙古人曾有过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兴盛时期。如蒙古族许多英雄史诗都有一段关于宇宙生成论的开篇，是用来说明它下边讲的历史故事之年代的久

远。在《蒙古秘史》里也记载了这种开篇的内容如第 245 段里写着：“自大地如土坷时 / 自江海如小溪时 / ……”。这明显已成了表明事件之古老的口头禅了。但它却证明，史诗之开篇来源于久远的古代之盛传此说的历史时期。又如“化铁出山”说，这个历史传说讲的是两千多年前蒙古人所遇到的灭顶之灾及其转危为安的历史过程。但它既不讲鬼神，又不讲命运，完全是靠蒙古人本身的团结奋斗。这表明形成这个历史传说时之人的精神状态，即没有受到宗教迷信影响的无神论思想。

这个历史时代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它的国家学说。这种国家学说的基本命题就是“身有首 衣有领”。这条哲理格言 它说明了奴隶主统治的国家体制之天然合理性。后来又出现了“千头独尾蛇遭难 独头千尾蛇免灾”的哲理寓言故事 这进一步说明 即使是部落联盟的大国 也必须有一个“汗中之汗”的道理。

(二) 据《蒙古秘史》记载 在阿兰豁阿夫人那时 公元 9—10 世纪) 在蒙古封建贵族中间已普及了“普的帝王”的概念 而到了 13 世纪创建蒙古帝国时期 “天无二日 地无二主”已经是公认的政治纲领了。这已表现出，新兴封建牧主阶级不但要统一蒙古高原，并且还要走上“世界征服者”之路了。

“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蒙古秘史》里记载的许多富于辩证法思想的哲理格言、哲理诗的出现表明，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很早以来，就曾发生过较为深刻的“哲学革命”。如第 254 段之阔阔出思哲理诗，则是这种新类型的代表作品。

(三) 元世祖忽必烈大力推行的政治和宗教改革，是适应蒙古社会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彻底克服奴隶制文化残余，全面实现封建化过程的需要的。他提出：“应天者唯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施政纲领，是对于成吉思汗以诚配天的贵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以“至诚”说批驳阿里不哥等皇室保守派 另一方面又以“实惠”说批驳了宋代理学。然而，忽必烈及其后代改革派却无

力克服统治阶级内部腐败势力的破坏活动，终于使改革夭折了。

14 世纪后半期以后在蒙古高原重新建起的北元王朝，在明、元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下，达延汗和阿拉坦汗先后着手继续推行了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这个被许多蒙古学家称之为“16 世纪下半叶的文艺复兴”的顺利实现，清除了萨满教奴隶制文化残余，使蒙古族社会从此全面地步入了中世纪文明民族的行列。

如果说，蒙古族从印藏封建主义佛教文化中学得了比较发达的辩证法，这又为进而从汉族封建主义文化中学习更为发达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作了准备 那么 18 世纪以后在清朝统治下发展起来的阿拉特运动的基础上，这些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却又成了较快地克服佛教唯心论影响的理论基础。

（四）从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旧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蒙古族作为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政治上的愚弄。于是，民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各地兴起。1911 年的辛亥革命 振奋了全国各族的革命斗志；1917 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指明了当代人民革命的航程：“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人民联合起来！”这极大地激发了蒙古族人民大众革命的大智大勇。从此，在以后几十年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征途上，在每一个重大的革命转变关头，他们一直都战斗在最前列。

蒙古国人民 喀尔喀蒙古人 从 1919 年建立起革命政党以来，无论是举行武装起义，还是发动全面的革命战争等，都走在斗争的最前列 并且在 1921 年宣布建立革命的国家政权之后，就成了和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围攻中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并肩战斗的唯一独立国家，而走在国际共运的最前列；而且把这种斗争局面一直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在欧洲和亚洲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这时 受蒙古国人民革命斗争影响最为直接的内蒙古人民，

1947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全面开展之际，宣告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内蒙古人民对于本民族内部开展几十年的自治运动两条道路斗争经验的总结，这个结论表明：在民族解放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上，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和建立独立国家一样，是真正解决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这个选择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正确性，以及人民大众对它的自觉性，不但清楚地表现在当时革命战争中的积极性上，并且还表现在全国解放之后的和平建设中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全国模范自治区这个伟大实践中。

这样，蒙古族人民在近现代革命史上成了率先全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英勇而智慧的民族了！而这既是对全世界民族解放革命的一大贡献，也是对自己民族的中世纪史上的历史污点的必要的大清洗。

然而，蒙古族近现代史何以这样发展？简单地说，这是蒙古族人民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之精华正确结合的必然表现。

列宁在阐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文化素质时曾指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来。这也正是在蒙古族人民中自发地兴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文化基础。其次，在蒙古族历史文化传统中许多优秀素质，在这个革命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也起了重大作用。如蒙古族很早以来，就养成了一种把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整个局势联系起来看待的优良素质。又如，摆在面前的困难不论如何艰巨，都要不屈不挠的去克服的坚强意志人们把它称之为“乞颜精神”。心理学告诉我们：“世界观的形成是意志高度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正因为这样，既

然实践出真知，那么勇于实践、敢于斗争的蒙古族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当然就是豁然贯通了；既然物极必反，那么不但经历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并且又曾成为“世界征服者”而吃够了民族斗争各种苦头的蒙古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之下，对于以往民族压迫的老路的彻底否定，对于平等联合全世界各民族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坚决拥护这个大转变，也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事了。

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历史证据，主要表现为它批判宗教以指引人们的革命实践。这在近现代史上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以往的历史转变时期主要是不发达哲学学习发达哲学，而这时则是所有发达哲学也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唯物论的最高形态，即批判地改造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蒙古族哲学所经历的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过程本身，就是证明它作为不发达的“真正的哲学”与所有发达的“真正的哲学”并无原则性区别。

恩格斯在阐明学习哲学史的重要意义时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这里说的“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是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设的伟大目标 这里说的“学习以往的哲学”当然首先是指各该民族自己的哲学史，其中包括不发达哲学史，因为这是启动本民族人民大众理论思维能力最有效的阶梯。所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为指导去研究本民族哲学史，这是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 四、关于研究成果的作用、意义和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上述研究成果，可以说只是在前无古人探寻过的荒原上走出了一条羊肠小径 以便于后人少走些弯路 也供其他兄弟民族研究人员探索本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参考。但对于创建蒙古族哲

学及社会思想史这个新学科来说，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作为哲学史一个新学科所必须解决的许多学术问题，都有待于今后深入的研究。我们现在觉得，依据当前条件，其中最为迫切的有如下三方面：一是蒙古族近现代哲学及社会思想史；二是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史料学；三是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范畴史。

（此文作者是内蒙社科院国家项目“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纲要）”牵头人。）

## 关于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断限和研究的评价标准

于江河

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其进行正确的断限及掌握研究中的评价标准，对于正确地开展工作十分重要。此文谈一下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与同志们商榷。

### 一、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断限问题

在分期断限问题上，近年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近代史分期上限是鸦片战争，下限应当下移到 1949 年全国解放。这是完全按社会性质划分的，所划历史范围，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另一主张上限太平天国运动从洪秀全、洪仁玕开始，下限到 1949 年全国解放。这些断限都没有得到学术界公认。我们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划法而分期的，即上限确定在鸦片战争（1840 年），下限划到“五四”运动（1919 年）。这一段从历史内容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历史是这样的划法，而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也应是这样的划法，这是符合蒙古族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史客观实际的。

另外，我们还依据一般传统的划法，“文革”前的《中国哲学史》、《通史》教科书等专著大体都是按此分期的；“文革”后《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政治经济史》、《蒙古族简史》、《蒙古族哲学史》等都是如此划限。后来史学界有争议，但胡绳同志 80 年代初出版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明确肯定了这种断限的合

理性。因此 我们这本《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文集》在分期上 也是如此断限的。我们还注重了两头 即鸦片战争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的人物，如果他的著作思想在近代的影响和作用较大 就放在这一期之内。如博明哲学思想 成书于 1801 年 但再版于 1900 年，重刻于杭州，说明博明著作在近代仍有较强的影响和作用。这与中国近代哲学史把龚自珍（生于 1792 年 卒于 1841 年）列入是一样的。龚自珍的著作在近代前问世，但他的著作思想在近代仍有影响作用，故列入中国近代哲学史。我们还注意近代史的连续性，选了几篇研究邻近近代的思想家的哲学及社会思想的论文，便于人们对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发展史，有个连续性和系统性的了解。

## 二、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评价标准

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中有个评价问题，评价要有个客观标准。内蒙“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课题（国家项目）组牵头人提出了四条标准 即 系统性、客观性、艺术性和科学性。1988 年中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对近代哲学史评价也讲了三条标准。即：（1）系统性；（2）正确性；（3）创造性；（4）实际影响。两位专家所讲的标准有的相同，有的相似，都共同要求研究成果要达到高标准的精品。我们同意这一说法，并在研究中执行了这一标准。

所谓系统性 按专家们指出是“形成一个体系”。怎样才算形成体系？这就需要包含的方面多，所讨论的问题广，而且具有一贯的中心思想。我们在研究中 对人物、专题就是按照上述要求去做的 从广度、深度上形成体系。如对博明哲学思想研究就形成了体系 包括本质论、可知论、辩证法、无神论及反佛思想等 他的中心思想是唯物主义。再如裕谦的政治、经济思想 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赈灾济贫、重农、重商及理财等思想 已形成了体系 他的中心思想是爱国爱民思想。又如夔清、延清、梦麟、瑞洵等 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爱国、爱民思想 但他们均属于乌托邦体系。列宁在

《民粹主义经济内容》一文中指出：“剥削存在 永远会在被剥削者的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列宁全集》第一卷第 393—394 页），因此 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同剥削制度相对立的社会思想。所以，他们所提出的人人平等、自由、婚姻自由、无贵贱、贫富之别等进步思想 在封建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都是空想的。

所谓正确性，是指观点正确。如何做到正确？我们尽力把握两条：一是符合实际，就是所讲的客观性；二是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在研究中，客观公正地揭示出倭仁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在当时成为官方御用哲学、御示“启心金鉴”“沃心金鉴”，成为统治者保守一方的指导思想，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哲学的实质；我们也充分肯定了尹湛纳希坚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特别是他提出反对本民族上层的反动统治的进步思想。尹湛纳希指出蒙古族人民受压迫更重，除了三座大山压迫外，还多一层本民族上层的压迫。因此，蒙古族人民反抗精神更大，这就为我们认识为什么蒙古民族会较早地接受马列主义提供了条件。

所谓创造性 是指提出新人物、新见解、新思维、新方法 阐发以前没有发现的真理。人类探索真理过程是一个长河的认识过程，必须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算是真理性的贡献。我们在研究中首先立足于蒙古民族的社会实践及其哲学和社会思想，其次用比较的方法探索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规律。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既是整个中国哲学及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又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研究中必须纵比、横比，更好地理解蒙古族的新思维、新见解。我们研究中发现较突出的有史诗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社会进步思想等。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抗侮图存的爱国思潮，反喇嘛教、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潮，维新变法改良主义思潮以及革命的民族民主主义等四大进步思潮。值

得指出的是，一些蒙古族思想家又从本民族区域走向全国社会思潮的前列。如爱国将领裕谦、僧格林沁的政治思想与反侵略观，延清、瑞洵的反封建专制和抨击理学谬论的意识，夔清、那逊兰保的反帝与较早的提出民主、平等、自由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进步思想在近代的传播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从博明把朴素唯物主义与自发辩证法思想的结合、无神论的出现，到尹湛纳希的唯物主义和罗卜桑却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对于唤醒蒙古族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思想家的进步思想，不仅在认识真理上做出了贡献，而且有新意，有深度。在今天，重温这些进步思想，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很有现实意义。

所谓实际影响，指论著和专著的社会作用、价值和影响。如果一本论著或专著发表在社会上毫无影响，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但思想的影响需要人们有个认识过程，一本论著或专著在当时不为人所知，但后来却发生了巨大影响。如博明所著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的《西斋偶得》一书，1801年（嘉庆六年）出版影响不明显，一百年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五月重刻于杭州后却放出了巨大光彩。我校在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中，有关人员的研究文章较早的论述了博明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倭仁的唯心主义理学，已得到了社会公认。我们力求自己的研究要有新意，有突破，如果不是这样，而只重复前人所讲，没有自己独特创见，其价值是不会大的，其影响力也是不会强的。

我们在研究中，更注重看思想、理论对实践是否有指导意义。在研究中注意防止从概念到概念，仅仅限于哲学原理联系，不能深入实际。我们尽力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解哲学及社会思想的理论性，把握它是否是真正的理论，是否是通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否是经过客观实际概括出来的理论，是否对现实生活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如果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和对实践没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的理论，不仅没有理论价值，而且也不会有社会影响。

另外，研究成果的艺术性也是衡量艺术价值的一个标准，这与科研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有直接联系。我们力争拿出具有创建性、艺术感染力强，影响较大的精品。虽然，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刚刚起步，但我们尽力按以上标准去努力，愿与学术界同仁不断开拓视野，为争取学术新成果而共同努力。

## 浅析蒙古族近代(清末)哲学史的几个特点

程作新

在清代蒙古族著作兴旺、学术繁荣、大家继起、新说迭出。蒙古族有不少学者自诩其学术“远迈前朝”，这确非自夸之辞。不要说蒙语和藏语著作，就以汉文著书的蒙古族学者就有一百廿多位，所见到的著作就有三百余部。近年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哲学史研究方面有不少著作问世，影响较大。仅从清末之际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创见颇为丰富，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给人以很多启迪。本文就蒙汉思想相互交流中所认识到的一些蒙古族哲学特点上，谈几点看法。

一、继承借鉴各民族哲学的精华，发展蒙古族自身的哲学思想

从清代几位蒙古族汉著看，蒙古族不在于蒙古族有没有哲学，而在于蒙古族的哲学不同于前人的哲学。蒙古族虽然研究汉族的古代经典、儒学、道学、心学等百家之著，但不完全重蹈旧辙，而是通过批判吸收提高到探索事物本质的高度。在探讨原始儒学、重新解释古代经典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理论思维，创造自己的哲学，否定空疏思辨之学，倡导客观求实之风，这是蒙古族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

蒙古族和璦？—1821年对儒学、佛学经典读了不少，但不完全继承，特别对佛学的一些观点，以试问的形式进行批判，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即“天地交气”的宇宙观。

蒙古族博明（1726—1787年）在1900年再版《西斋偶得》一书读“易”篇中，也不是唯心的解释，而是唯物的理解。用批判的态